

中共党史上的两个历史决议

中国共产党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
若干新认识

肖 光 文

摘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结论可以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决议》中一些论断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这主要体现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29年历史总体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方面的新认识。把坚持《历史决议》和深化历史认识统一起来,成为我们研究和宣传党史和国史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新认识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32年历史的基本经验和深刻教训,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根本是非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在党内外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历史决议》发表30多年来,其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党始终坚持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分析,因为这是“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①。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应当伴随时代的进步、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化,做到与时俱进。江泽民曾指出:“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②《历史决议》发表3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反思历史问题、深化历史认识,提供了新的角度。所以,我们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在深化和前进。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历史决议》的基本论断和基本分析,把遵循《历史决议》与党对历史问题的新认识紧密结合起来,把坚持和发展有效结合起来,为我们研究党史和国史提供了新的方法指南。本文旨在探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决议》中若干

收稿日期:2011-12-01

作者简介:肖光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071)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①龚育之《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江泽民《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93年11月2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7页。

论断认识的深化,并作一粗略的概括,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的新认识

《历史决议》发表以来,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经过了一个逐步清晰、不断深化的过程。《历史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①。

《历史决议》明确提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后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指出,《历史决议》发表的时候,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两年多的时间,三中全会所带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尚未完全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起步,对于将要引起的新时代的深刻变革的矛盾运动,党和人民的认识还不是非常清楚和明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的评判也只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初步认识。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逐步深入,党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历史决议》发表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拨乱反正”联系起来论述,并且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1年胡耀邦提出“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的巨大意义,“在于它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依靠群众和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更是明确了这一观点。“自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更加明确强调中国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划分的重要界限,更加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他指出“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④“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⑤“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⑥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⑦此后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开始了热烈探讨,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

伴随历史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显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1页。

②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7月1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62页。

③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④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

⑤ 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⑥ 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2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9月28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8页。

得更加清晰、更加深刻,进一步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历史地位就显得更加迫切、更为需要。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已有的认识成果基础上,坚持把实现伟大转折和开辟新时期结合起来进行评价,不断深化了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1989年江泽民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①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之不易,突出了历史转折的艰难。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那时要摆脱困境,打开局面是多么不容易。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②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所作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③。2001年7月,江泽民更是强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④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全面推进、更加深入的历史条件下,认真总结近30年的历史经验,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伟大革命”的开端,进一步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2004年8月,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⑤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⑥随后,胡锦涛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进而深远影响,已经、正在并将进一步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示出来。”^⑧

毛泽东曾指出“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⑨《历史决议》发表30多年来,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发生了深刻的认识变化。应当指出,《历史决议》虽然提出了“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当时对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6页。

②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③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④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96页。

⑤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22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9-151页。

⑥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⑦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88页。

⑧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95页。

⑨ 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9页。

命”的意义而言,还不像后来那样,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全面展开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转折的历史意义。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历史地位经过反复思考、沉淀和总结,在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认识,对此历史评价也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这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反映。

二、关于对新中国成立后 29 年历史总体评价的新认识

《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 29 年历史的总体评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历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①可以说,这个基本论断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对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主流和本质的科学概括。《历史决议》对这段历史的具体评价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是“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遭到过严重挫折”,但是“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此后两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肯定了这些评价,并且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重新审视历史,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又有若干新的补充和阐释,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决议》关于建国后 29 年历史的总体评价的认识。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实际,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作了更加详细的阐释。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错误,特别是强调了“左”的错误。他指出“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②他还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反对“左”和右两个倾向,但主要应当反对“左”的错误。他认为“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④

邓小平还多次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好,中间二十年犯了错误,情况不大好的观点,从总体上对新中国成立后 29 年的历史作了客观的评价。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三十九,头八年好,后十年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⑤他具体分析了这段历史,认为“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发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就是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794 页。

②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 年 4 月 15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5 页。

③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 年 8 月 28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6 页。

④ 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 年 4 月 2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5 页。

⑤ 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1988 年 5 月 18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0 页。

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①

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二十年“左”的错误概括侧重于政治角度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二十年”是一个约数。在他的论述中有时指1957年到1978年,有时指1957年到1976年,这是因为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不一样。而且邓小平对二十年期间“左”的错误程度的评价,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例如“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②“‘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相比较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更大的挫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对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评价又作出了新的概括和阐释。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江泽民始终坚持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失误统一起来评价,既明确肯定成就,又不回避错误,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支流。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治愈了战争的创伤,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③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④。他还指出“我们必须充分肯定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任何怀疑、否定我们成就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同时,我们又必须充分认识和坚决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不承认失误的观点,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和有害的。”^⑤1991年江泽民又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族人民迸发出空前的建设热情,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出现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⑥

江泽民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还特别突出了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他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⑦“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①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254页。

②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③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2页。

④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5页。

⑤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4页。

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0页。

⑦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页。

国民经济体系。”^①他还指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②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评价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认识成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作出新的总结,突出强调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是探索中的错误。2003年12月,胡锦涛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同志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③他还把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评价,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承继和发展,进一步肯定了这段历史的功绩,彰显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④

由上所述,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成立后29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在坚持《历史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过程,突出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深化。遵循着这样的历史主线来重新审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是我们党对这一段历史评价的显著特色。显然,这种新的角度和历史视野,是对《历史决议》基本思想的继续深化和丰富。

三、关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认识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科学的认识。在《历史决议》中也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历史决议》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⑤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我们党从“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论断,到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

从党的十二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

①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08页。

② 胡锦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1999年5月4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35页。

③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12月26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1页。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43页。

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1页。

则。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并且指出贯彻这一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①。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②“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③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们党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阐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随后,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多次讲到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问题,并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85年10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④。他还继续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⑤

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⑥。会议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⑦可以说,这些理论探索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作了铺垫。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9年江泽民提出了关于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同私有制基础上基本由市场自发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⑧“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创造一种适合中国的情况的、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商品经济运行机制。”^⑨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⑩可以说,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随后,党的十四大在上述认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①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3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8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69页。

④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

⑤ 邓小平《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

⑥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⑦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27页。

⑧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20页。

⑨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①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②。随后,十四大党章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总纲之中,进一步加以明确。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十五年来的探索成果和实践经验,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随后,党在历次重要会议和讲话中都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伟大历史意义。1998年12月,江泽民指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艰辛探索而取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改革成果,多年来争论不清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③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④

由上可知,在《历史决议》中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尚未完全展开,对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成熟的经济理论。应当指出,后来提出了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理论也并不是违背《历史决议》的基本分析。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深入,我们党在先前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前进,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这无疑又是对《历史决议》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四、关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认识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之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认识并不清楚,许多纲领政策超越了历史阶段。《历史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时,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深入思考,萌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历史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⑤。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断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得以深化和展开,

①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19页。

②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

③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86页。

④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页。

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8页。

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重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①的论断。随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②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对社会主义阶段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早在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要处于一个什么样阶段,就是处于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③这不仅明确了党的十三大所要处理的重要的理论命题,而且特别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的历史必然性。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分析了它的含义、原因、特征,深刻地论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④大会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⑤

在此之后,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加成熟。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发展进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⑦

十五大之后,江泽民强调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最大国情来认识和把握。1998年,江泽民指出“当今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才开始认识了这个当今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从而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奠定了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

①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68页。

③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④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9页。

⑤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页。

⑥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11页。

⑦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

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①

2002年党的十六大关于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一阶段的划分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确立,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丰富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报告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〇一〇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②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涵。2007年2月,温家宝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不仅明确肯定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而且还强调“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进而根据上述论断又提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促进社会和谐。”^③很显然,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已有认识的深化,是在历史基础上的前进。

总之,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决议》认识的深化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还有许多内容。笔者窥豹一斑,旨在说明《历史决议》发表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改革开放新的实践,重新审视历史,在坚持《历史决议》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历史决议》的认识,有效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决议》。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着理论创新。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决议》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基础上的,从根本上说是对新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样,就必然会推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建设规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产生新的认识。这些新认识和新论断的产生,符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实践每前进一步,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就加深一步,理论创新就前进一步。我们党对《历史决议》的认识,也必然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着的实践而不断深化,形成新的科学理论。

实践已经证明,《历史决议》是我们对党的历史认识的权威,应当牢牢坚持其基本思想和基本结论。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对于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④。同时,历史在前进,理论在发展,人民对历史的认识在进步,因此,

①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80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4-15页。

③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2007年2月26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906页。

④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1年第13期。

我们对《历史决议》的认识也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历史决议》认识的与时俱进并不是违背决议,而是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方法和精神,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和新鲜经验,作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解读。针对《历史决议》的内容和观点的创新和发展,胡乔木也曾指出“《历史决议》并不是认识的顶点和终点,我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深化。不能因为有些话决议上没有说过,就认为是违背了《历史决议》。如果这样,党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1981年的水平,而不能再有所前进。”^①这些无疑都说明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能停止和僵化,它需要伴随新的实践而不断深化和发展。

笔者认为,坚持《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和对《历史决议》认识的与时俱进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两者有机的辩证统一。我们应当在研究和宣传党史和国史的过程中将两者统一起来。只有将两者真正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党史和国史的研究发展,才能真正有效地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所以,我们应当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不断深化对《历史决议》的认识,对其基本思想进一步阐释、概括和发展,把坚持《历史决议》和深化历史认识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On Some New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Second “The Resolution of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iao Guangwen

Abstract: The basic idea and the basic conclusions of “The Resolutions on a Number of Questions of the Party’s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can be said to have withstood the test of history proved to be correct since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reo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kes gradually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in some of the conclus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which are i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29 year – histor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theory, theory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socialism and other aspects. I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for national and Party’s history research to adhere the “The Resolution of History”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Party’s history.

Key Wor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The Resolution of History; New Understanding

[责任编辑:张栋豪]